

季蒙 / 著

周易的思想体例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的思想体例 / 季蒙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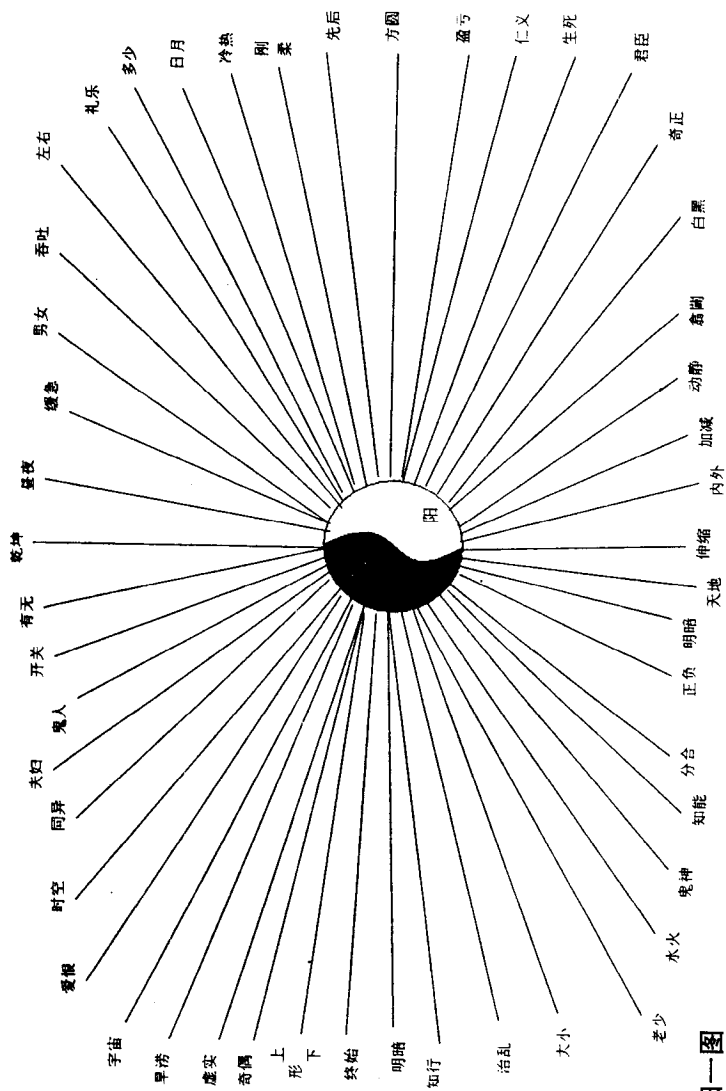
ISBN 7-203-05524-8

I. 周… II. 季… III. ①周易—研究②先秦哲学—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3969号

周易的思想体例

- | | |
|---|---|
| 著 者: 季 蒙 | 网 址: www.sxskecb.com |
| 责任编辑: 冯 昭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 出 版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 承 印 者: 山西方略印业有限公司 |
|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
| 邮 编: 030012 | 印 张: 10.375 |
|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 字 数: 230千字 |
| 0351-4956036 (综合办) | 印 数: 1-600册 |
| E-mail: Fxxz@sxskecb.com (发行中心) | 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 |
| Web@sxskecb.com (信息室) | 印 次: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
| Gujshb@sxskecb.com (综合办) | 定 价: 29.00元 |
-



阴阳一图



前 言

季 蒙

周易的研究有久远的历史。以中国的情况论之,大致可以分为古代部分与现代部分。古代部分又是传统的研究部分,这里面包括对周易经典的解释与发挥,既有义理的,又有象数的。从解释的文本来说,历史上有三种最为基本和重要,即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和朱熹的《周易本义》。这是因为,孔颖达的周易注疏是在集中了前代周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抉择而定的,从而使历史中的周易典籍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定本,这是基础工作。具体情况在《周易正义》序中讲得很清楚。但是孔颖达注易是偏重于义理一路,以王弼注为底本。这样,在象数方面就不着重。而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以保存汉易著名,正好在象数方面对《周易正义》形成补充,所以是留存到现在的相当基本的一部文献,于是义理象数方面乃得以完全。但是王弼死的时候年纪很轻,在学问的厚积上难免有一些问题,虽然孔疏选择王注为所本有一定的考虑,但其中的不足历来学者也多有议论。当然,宋儒对孔疏周易的非议含有排释老的因素,孔氏《周易正义》与李氏《周易集解》基本代表了唐以前的周易解释情况和水平。而宋以后理学时代最基本的文本解释却是朱熹的《周易本义》,虽然注解十分简易,但是代表了理学的基本态度与观点,而且是在吸收前人易学成果的



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比如伊川易传等。明清以后,易学研究有强烈的朴学实证色彩,开始了另一个时代。

关于易学的发挥和旁支更为繁复,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周易乾凿度》一书,郑玄注,有乾隆丙子(1756)雅雨堂版。前有德州卢见曾序,就说到对待纬书的不同态度,认为先秦纬自有其价值,乾凿度就是一例。但这还是就易义发挥的。像汉扬雄的《太玄》,更是直接仿照周易的形式自作的一部书。但是,从数上来说,《周易》是八八六十四数,而《太玄》是九九八十一数,只是《太玄》远没有《周易》那样自圆,无论是算法上还是文本方面,都有很多不对应的地方。宋司马光为《太玄》详细作注,而他自己也作有《潜虚》一书。这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着重范数、名范。《潜虚》是五十五数。在配数方面历代的著作还不少,像蔡沈的《洪范皇极》就是一例。他是参照《尚书》洪范九畴按九九八十一数配的;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也是在象数方面很着力的著作。象数的历史十分久远,它是中国思维中一个极普通的干部。一直到现代,始终贯穿在人文的各个隅中。有一点须注意的,就是象数的配法,了解了这一体例,各种学说就不复杂。比如汉京房的易学,就是把天文、人事、日用等各个方面配在一起,其旨就是为了用统一体例给宇宙人事一个大一统的说法和解释。因此,数与象的关系,就是一个辐射分殊的关系。数是中间的一,而象是一切方面的。如气味、声音、律吕、性情等等各个隅。这样,只要我们做出一份详细的象数表,就如历史年表那样,人文中一切生活及知识部门的统一就清楚了。所以,象数与义理并不是相对的两个,而是易的自然生发的阴阳面,最关键的是对中土的思维首先要做到达意。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对历史中的事物,在感性认识及达意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所以才经常出现测量不准



的误差,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这是另一方面。

古代关于易的研究、解释与发挥过繁,因为易与中土一切人文隅胶合在一起,所以这里根本无法列举。在《四库全书》及《续修四库全书》等丛书中,保存有大量易学文本,可以参看“易部”。需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的易学研究与传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这些研究并不一定很准确的当。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古史辩派讨论周易的一些论文,当时是以打破古史中的陈说为务,他们攻击和否定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等说法,但是这与时代背景有关系,所以说,古史辩派在文化历史上的意义较学术上的意义为大。二十世纪的考古发现总是获得与疑古派意见相反的证明,比如最新从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易,就说明易的情况相当原始久远,更有早于周易系统的。可参见《周易研究》二〇〇一年第二期有关论文。易的原始乃是一些卦爻符号,至于卦爻下所系之辞本来不是一定的,现在留传下来的周易文本系统也只是一个文献参考,并不能完全绝对化。关于二十世纪借用易学发挥构成自己学说思想的,最著名的是熊十力。他在《新唯识论》、《体用论》、《乾坤衍》等书中讲的翕闳成变,借易申说宇宙构建模式等义,曾发生很大影响。建国以后的易学研究曾受到唯物论的影响,另外考古发现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关于周易的文化史与哲学史的研究也不少。这里面较著名的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等著作,还有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通义》等作品。朱伯崑在周易哲学史研究方面是较有代表性的。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则有邓球柏的《帛书周易》,讨论解释较详,是很好的参考。《文物》杂志中也有很多相关资料。

现代周易的研究不仅限于大陆,海外也很有发展。而且范



围、方面很广，较注重学科的比较与交叉。比如《周易研究》二〇〇二年第一期讨论遗传算法与易算法问题的论文。概要言之，易学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诠释学、历史社会学、美学、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计算数学、生物医学、天文学等各个学科，在现代学界都发生了广泛的交接。比如讨论易与推类逻辑、易与心理分析的研究方向；现在瑞士南部阿斯科纳有一个爱诺斯基金会，《周易研究》二〇〇一年第三期有专文介绍，是一个与易有关的组织。海外与易有关系的组织还有若干，如美国成中英国际易经学会，以及史密斯办的《周易网络》杂志、比利时《世界太极科学》、法国“周易中心”等。研究专著也有一些，如美国卡罗尔·安森《易经的哲学》、德国卫德明《易经八讲》、《易经中的天地人》等著述。但是海外研究周易的，仍然是以港台日韩的为多。韩国与日本的研究，较多地以中国为参考坐标。比如韩国讨论熊十力易学，以及新儒学、易与中哲史的论文就不少。当今世界上国际易学研究的情况，基本上可以从大陆办的《周易研究》反映出来，发表论文极多，另外还不断介绍新出版的周易研究专著，可以参考，这里不能赘引。另外刘大钧有近百年易学研究回顾的专文，见二〇〇一年第一期，也可以参考。据称现在已有与易相关的互联网站三百多个。

关于易学西传的历史也有几百年，比较著名的例子是莱布尼茨，据说他从易卦爻阴阳性得到启发，用二进制造了一架计算机，他想把自己的发明献给康熙皇帝而未果。黑格尔在哲学史讲录中也讲到了周易。早期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学说思想可能是用的传教士的译本。据统计周易的译本目前有二十多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曾记述过当时来华传教士勤奋研读中国典籍的情况。但是，中国经典的基本特性是它永远不能离开解释，而且历史中的解释是逐代堆叠的。因此，真正要译介中国的经籍，



就只能把像《十三经注疏》这样的典籍完全翻译才行。否则,对中国学术中枢的触碰,不是猎奇的,便是猜测的。而且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域外学者对中国学问还能够持比较认真的讨论态度,比如最近出版的《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作者比较认真地讨论到汉语言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语言领域,在一切文化学术部门与分科中,比如经济、文学等,都有过比较慎重的对待。这些历史中的学术情况,我们也须有一个估量。

周易在历史中的研究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再做周易研究意义何在,又有哪些工作还可以做呢?事实上,这就触及到了最实质的问题,那就是,历史中的学问,在人文史中本身是有一个升降的,即历史学问(如周易)并不机械地、直线地随时间推移而进展,有时候反而发生偏离。比如易学,自近代以来,情况就比较乱,使人无所适从,而且有很多江湖性的东西。因此,周易的本体必须还原。因为易学是最原始也最朴素的,它的连绵性非常强,只有把周易最基本的东西认清楚,我们才有可能确立一个坐标,这就是易学的体例。事实是,周易本身是很难穷尽的,它可以无限衍展,这就像辐射,我们先要把辐射源考定清楚,这是基础的工作。有了这一个起步,即正始,那么下面无论推展多远,我们都有了一个始点和依托,这就是周易的基本思想的作用。必须说明,二十世纪的学术中有些因素是破坏性的,比如古史辨派,很多结果与考古相左。之所以不能有建设性,还是因为对人文本身的性素不能了解,所以也就不能自信,相对于历史中的成绩反而回去了不少。另外须说明的是,国外的东方学、汉学研究虽然可以参考,但毕竟不能取代中学的传统方法与积累。因为汉学家在感性与达意上有时候会有问题,这些都是可以估量的。关键还是学问本身的径直考察,我们要用自



己的思考去测量。所以这一次研究周易,就是打算把易学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重新确认清楚,并讨论它的可能走向。

周易研究属文科学,文科学虽然是软科学,但是牵涉面极广,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案原始易问卜吉凶,考其起源还是由于人的不安全感,从这里来看,易本来就是出于实用的,而且易作为忧患之书,其原始性素保留下来,不断发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关于易的很多原始情况,很早就已不可考了。比如孔颖达注解《周易》时,解释卦的意思,引用纬书的说法,就能说明问题。但是古代问卜吉凶,并不止限于占卦一途,还有诸如龟卜、占梦等办法,这些在《周礼》中都有详细的载录,可以参看。从这里来分析,古代人有收集事情结果与占卜所示相互对证的传统,由此也就决定了一个广阔深厚的经验总结基础。因此现在看到的周易卦爻下所系之辞,便是古代生活中的实事系录。那么《周易》文本也只是一个参考文献,而最绝对的,还是卦符本身。比如说需卦上六爻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文王被囚羑里,纣王派几个人去监视他。从重卦来讲,应该是很原始的,因为排列组合本来是初民的能事。现在对周易的研究,常喜欢用文化人类学的手法来处置,其实并不妥当,还是应该本以传统的经学方法。比如章太炎在《煊书》中便引用人类学材料论到上古易数的情况,明显有不妥之处,可以参看。

在易学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一般而论,易在政治历史上的影响是最大的。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到它的人文实用性,而这种人文实用性的消息,并没有消失。明末王夫之说他是从观卦进入易学的,观之义,就是考察人文历史之兴衰更替的。通古今之变,就是一种观,这反映了易之为书忧患之义。举例来说,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取诸卦以治,从离卦到夬卦凡十三,其内容包括了渔业、农业、商业、政教、水陆交通运输、守备、兵器、建



筑、丧葬、书籍文字等等，城市的兴起，文化的创建，都包括在里面。其实诸卦所显示的，就是一部人文史。由此，不夸张地说，人文生活中的一切具体、抽象内容，都可以用易符标出来。比如理学，朱子认为人文史是不断剥落退化的，但是剥到尽处，会有一个来复。这就是阴阳升降来回之理，毕竟理还在。依此类推，卦符的用处是无穷的，该摄的。至少中国人文史都可以这样处理，极为简易。这就是体例，是思想上的一种观法和处理。像良知、本体、性、理、道、气、无、玄、太极等等，都可以用大畜卦标示（象义）。这样，就真正达到了卦一分殊（诸象义）。所以华文化是一个辐射的“一”，最简单，也最繁复。这是其一。

由此，当我们把各个学科与知识部门理会为分殊的诸象义时，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现成的大一统体例语言。百科全书式的个体知识结构，也就是现成的。比如《道藏》里面的语言，是讲丹学、医学、武学、养生等等，但其语言与理学多相通，如道、气、理、性等关键字词，这就是体例语言。《老子》中的一句话，在武学中是太极拳，在理学中可能就是治心明性。比如“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之类。我们可以在各种典藏文献中清理出一个专门的语库，而且有一个很明显也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就是，历史中的注如此发达，而注与所注之间，常常就是统一体例与学科分殊的关系。比如说一、二、三数，在形学中就是圆、方、勾股。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统一象数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数学史上总是以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呢？这就是因为象数思维的指导作用。几何是象，代数是数，如割圆术在中国古代数学中发展得就很繁复，而华文化就是很尚圆的，因为圆最奇妙。像太极拳，全是圆的力学的运用。数学并不是统一的，因为数的理念因人文系统会有所不一样，比如华文化中的算术，乃是一种轻重数学的东西，它不是绝对数学（理论上求绝对）。像九宫格可以



无限衍分,分的细化程度随需要而升降。现代微积分实际上是数学上的一种让步处理。中国古代勾三股四弦五之说不能单从具体结果去理会,因为易学传统极注意配数,故而也极在意“象”之间的奇妙数关系。尤其从一到十数,更被注意。勾股弦不过是具体的几项“象”而已,而三、四、五数,都是很关节的元数。由一到十到无限之数,每一个数都有其分位,是不能乱的。因此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等说法,还是一种外铄性的解说。因为根据易数的体例,就是阴阳奇偶轻重升降,十数的一、三、五、七、九奇数,二、四、六、八、十偶数的派生是很自然到位的。一、二更不用说,像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三百八十四等,就是自然的两仪疏分。我们通常说圆三百六十度,这是人为制定出来的,因为靠自然衍分,只能是三百八十四分,正当易数;三百六十度的制定可能还是为了方便,从各种配合情况来看,如果就易数学不断派衍下去,会不会导出另一种数学系统也不一定。当然,易学的实用性不局限于此。

从思想上说,易数对中国的学术思维做了根本的定位,很难改变。即以卦爻结构来说,就能表明,中国的观念与其说是知识的,不如说是认识的。因为每个卦都有自然之象和人事之象两重“义”。自然之象是原始取象,人事之象是“命义”之象。重点在人事,也就是人文一边。所谓万物之情者,盖指了解万物的情况与实情。所以中国古代思维,更偏重认识的功用,还不在知识一边,也就是说意义很重要。以经济来说,汉朝一石米可以五钱,这是民生宽裕的时候,碰上动乱之世,一石米高达万钱。经济轻重,与治乱轻重,说明决定价格的是意义,而不是价值。治世的一石米,与乱世的一石米,意义不同,有轻重升降。易学就常常称量这一类轻重升降,通过卦变爻变来“当”之。那么,对中国的思想与学说,也应尊重到:它的认识性质,通常先于它的



知识性质,人文测量才测得准。像中国工艺技术的发展,就不是科学的,而是实学的。实学与科学是两套理念,即使现在,华人对技术还是实学的认取。比如“科技”这个词,就是实学造的。据说中国以外很少有此提法,这些都应该注意。易学与各种文化学术部门的关系很繁,这里不能尽举。但是其中的实效性我们是完全看得清楚的。总体来说,易学在人文学科上的直接价值比在自然科学方面更现成,像中医与易学间的关联就是不言自明的。最主要的,是易学本身如果衍展下去,有可能产生新的学问。清代焦循是易学名家,在数学上也很有成绩。但是焦循对易的解释,完全用爻变坐实的方法,是否会有拘滞的一面,也须讨论。比如艮卦六二爻:“六二,艮其腓。”注谓:“腓,犹匪也,谓兑四之艮初成节。”这样,每一个卦中的每一个具体的爻,都用其他卦的具体的爻之间的相互变动关系来坐实解释,虽然有严整的体例,但却限制了易变动无穷、无一定之宜的原义。这些是必须活看的。必须看到,名学与易学间的互动也不可忽视。比如墨辩取予之义,正能对解易卦爻取象予义的现象。这些在论文中都将讨论。虽然我们的重点放在先秦易学,但是易的边延本来不容易划定。是否就能机械切分出先秦以前之易和先秦以后之易,这些只能在研究展开以后再来不断调整了。

易学研究的难度主要在对易的始原很难确定。易学的很多基本内容历代学者只能凭推测等办法去处置,这种情况在孔颖达注疏《周易正义》时就如此。比如在解释卦的涵义时,便引用易纬乾凿度的说法。孔颖达引用纬书和老庄之学注《周易》的地方不止一处。现在的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考论易的一些始原问题,虽然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说法、观点,但最终仍然是不能定论的。比如说易数的问题,就非常麻烦。以李鼎祚《周易集解》为例,在注解“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条时,



引用了晚近崔[覲]的说法,而李氏《集解》却是以保存汉易著名的。可见李注本身有抉择标准在里面,一定有所比较,并不是一味准以古代学说的,首先还是从易理考虑。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古人治学的态度。这样的例子随处都有。也就是说,易的原始,即使动用再先进的考古方法,也已经很难确证。但基本的情况,却大致不出《周易》文本本身所说的古人作易、仰观俯察等说法。因此,在易学的研究中就有一层分别,那就是,我们研究易学,重点是放在思想学说的考察上,是将它作为一个人文义理思维传统去对待。因为即使是易的各项原始制作情况都得到了实证,也仍然不能包括历代学者对易学的学说发挥,而后者显然才是真正的庞大的系统所在。这种情况在字学研究中也有,比如《说文解字》。最重要的,不是文字制作本身的原始事实情况,而是经学家对文字制作及内含之义的系统的说法。这就是思想学说本身、思想学说之本体。所以我们的易学研究不是考古实证工作,重心还是放在义理的工作上。

关于研究方法及技术思路,简言之是为了探求知识体例,因为中国的传统历来是较重一统的。而在知识上这种统一又是历史事实,如前所说,用来统一的就是一贯的知识体例。像《古今图书集成》就十分明显地使我们看到,中国人文传统的各个知识部门是系统齐备的、自身配套的。这些学问部门牢固地统一在一起,贯穿于它们中间的就是体例。人文知识的体例是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每一种人文都有自属的体例及全备的系统。举例来说,如阴阳两仪,无论是在数学、医学、武学、经济、刑法、政治、历史种种领域中,都形成无处不在的辐射与分殊,那么阴阳就属于知识体例中的关键的一项。事实是,人类各个群体都发现了广泛的阴阳性。比如很多语言的词性就有阴阳性之分,像德语中的钥匙一词属阳性名词,而锁孔一词却属阴性名词。



但是,把阴阳性全面发展为一种人文的却只有中国人文。易学及思维与一切学问知识部门领域相关,所以研究易学就是求得思维体例,就是为知识学问的一统做准备。比如易数学,它表明数学并不是统一的一般科学,数学也是一种具体的文化思维。关于这一点,此处不能细论,在论文中我们会谈到。

这样,我们就需要充分利用到各个传统中国学问的门类、方法。比如说名学、字学、史学、礼学、朴学、学案等等,甚至包括自然物理在内。但归结起来,经学是统一的核心与灵魂。因为易学本身就是经学的,这就是“研究从性质、方法从类别”的原则。即以朴学论之,首先我们理解为义理对勘集合。通过这种方法的处理,使义理本身的情况得到最大程度的确定,而不是推断和猜测。举一个例子,“墨辩”中有“撓”这一条,义理上很重要。而《荀子·议兵》中就有:“延则若莫邪之长刃,撓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两相对勘,撓的意思和内涵就完全确定了。但是孙诒让在注解中却用了更费事的办法,并未用荀子之书。可见前辈大家在朴学方法上也还留有余地,并没有完全饱和。另外孙诒让解释“墨辩”中“卧梦”等条时,没有结合《周礼》中六梦之法的内容;而孙诒让是周礼权威,可见,前人提供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方法范例,并没有到毫无余地的地步。这就是说,历史中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可以作终结了断的。每一种方法都是在一定程度和限度内使用,其关键是“类性”要搞清楚,通过针对性的使用,便能发生宏伟的效果。

有一点须说明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自觉地尊重一个纯种原则,这不仅仅是别同异的要求,同时还有一个体与用的问题。因为没有种的纯正,就不可能有原发的成果。近世以来,东西学之间的比较交接讨论,毕竟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时的事体,它属于用的层面,而长时段的易学(包括其他一切学问部



门)传统之本体却是自属的,并没有与西学相涉,这是体的方面。体用的区别,我们有必要分清楚。两者之间固然有相扣的连环关系,但是如果自己本身不能独立地搞清楚,而用别种思维和学说来诠释,那么最终的诸如东西学的讨论也就不可能了。简言之,人文比较属于使用的层面和方面,而人文本体是自属的。它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比较,而是自身的推展。

前面说过,易学思维是历史中的一般思维,很难具体限定在哪一时代,作机械的朝代切分,而且也很难限定为某具体的著作,因此研究重心放在思想体例上进行论述是明智的。先秦易学是以后历代易学的基本框架与体例,而易学又是中国传统思维领域的一个框架体例。体例作为一以贯之的东西,就像一部辞典,无论它的条目有多少,只要把握了辞典的体例,就可以随时使用,就不会觉得知识是无限的,难以把握。易学的基本体例,都是围绕阴阳两仪展开的。所以易学的难点不在于它自己有多少,而在于它作为基本体例可展开的限度,这就是唯至简乃可以至繁的道理。易之三义,简易一层就包含在其中。像历史中焦循的易学著作,就是探求易学体例的著作典范。之所以历史中发挥易学的著作那么多,而都能各圆其理,关键就在于易学自身可衍展的广阔性,即只要不是强行附会的,通常都可以落在易义的自然范围中。所以,说明易学的体例连绵性质,何以易学能接通各门历史学问,既是难点之所在,也是学术上最有价值和意义的要点。

就历史上所做的文献整理工作来说,汉代学者确实做了极为扎实的基础工作。刘歆父子校理群书,对经典的定本是进行了抉择比照作出确定的。比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老子写本,与现在的通行本比较就多有歧出,可见汉时各种典籍确有多种本子流传。马王堆帛书写本较今本更原朴、更朴野。虽



然年代久远,极为珍贵,但学理上还是现在通行的本子可靠。这一层是要说明的,即尊古也有一个原则抉择尺度。但论文的重心不在考订,而是放在义学。周易的义理系统,并不是一个只能猜测比附的对象,而是可以确定的,这是因为易从本性上说不是玄学,而是上古的文物,关键是摸清楚周易自身配套的学说理路,这一理路超不出六十四卦的范围。所谓六十四卦,也是由一个最基本的体例不断自身翻衍、排列组合而来的。所以任何一个易卦,都包含着周易卦系的所有信息,这是从原理上看。如果追究易卦系统的原始,只有符号才是最根本的。至于卦下系辞都还是经历过变迁,并不是最一般、固定不易的。从现在遗留下的连山、归藏卦系的残断、断片情况看,完全能说明这一点。像《帝王世纪》等古书中所讲的上古人文中神农黄帝、连山归藏等相关情况、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无稽的。以周礼载录的情况参证之,古代太卜之官并不限于占卦一事,还有关于通过梦卜问吉凶的事情,而且每一个梦要收集起来,进行总结。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初先民占卦所得的符号,也是要不断与发生的实事对应参证的,经过千百年的实验堆积,总结出在经验概率上靠得住的说法,渐渐约定下来,形成自圆的卦系系辞系统。这完全有可能,这些必须结合古文献具体讨论。

由于周易牵涉的广泛性,详细的情节只能在论文中才能具体展开,这里不能一一说到,所以只能例举几点主要的略加说明。周易的每一个卦,都与中国的人文通史相伴随、相始终,六十四个卦配合成的卦义系统,对人文全体起一个基本的收摄作用。延续到理学,即形成所谓范数系统。范数系统即是理学家用来该摄人文与自然的基本的观念手段,无一遗漏。卦义正是最初的范数系统。比如讼卦说,人之所以有争讼,是因为契约不明,如果明立契约,就会息止或减少争讼。这颇能说明古代中国



社会中诸事重约定的性质，这一类的消息很值得留意。另外如剥卦，在义理上的关涉极广，而且义理明确，很有代表性。比如朱子谈人文，常常就牵涉到人文剥落的问题，他说人文史最多不过万年，且是在不断退化的，这属于人文剥卦。他又说，山河大地陷了，理还在，这属于自然之剥。但理是剥不掉的，所以又有剥尽复来一义，卦系是互相配合的。先秦人文史更是如此，比如老子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等，就是一幅剥象。人文不断剥落而不得不至于礼，礼正是中土人文上古剥到最后的結果。紧跟在礼后面的就是兵了，周代的历史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由此看来，华夏人文是一个极早就剥到了本质的历史，它可能只是人类历史人文的一个预演。比如说它没有宗教，没有神话传统，等等。很可能这些东西在上古就已经剥落掉了，因此它一早就直接进到了世俗社会。左传中记录的各人对易卦的不同态度，就是论文要细说的。这些正可以联观。足见易卦就是一个符号化的人文史，是一个大的符写。像大畜卦所示，天在山中，也是具有广泛标示意味的。因为它直接“象示”道在器中、形上在形下中、理在气中、性在心中、礼制在名物中等等义。所以，论述卦义本身就是一个人文正始的基础理论工作，其意义不言自明。

如果更一般地说，易学透露给我们的观念起点才是最要紧的。比如《周易正义》开篇即解释说，悬挂物象显示于人。这就是说，世界只是一片法象，是显示给我们的。思想学说所讨论的基础问题，都不能脱出这一基本认定和设定，这一解释是符合原始易义的。由此，每一个卦都按照一定的基本体例展开，首先是阴阳两仪性，通过爻画的连断来标示，阴阳是最基本的。虽然阴阳性在人类各个不同区域都有所认识，但普遍的阴阳人文及思维只有中国最典型。比如西语词多有阴阳性之分，而汉字没